

20世纪
中国文学
研究丛书

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1976) in the Perspective of Pure Literatur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毕光明
●
著

20世纪
中国文学
研究丛书

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1976) in the Perspective of Pure Literatur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毕光明 ● 著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

总 序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在谈及自己的学术研究时说：“我研究中国文化、社会、思想史，一向比较重视那些突破性的阶段，所以上下两千年都得一一涉及，但重点还是观其变。比如上至春秋战国之际，魏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下到清末民初之际，都做比较深入的研究。而至于一个时代定型之后没有什么太大波动的，往往置之不论，所以在学术思想史方面，我并没有从事前人所谓‘述学’或‘学案’式的工作。”余英时对“变动”的兴趣给人以极大的启发，而20世纪的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极具“变动”特色的时代。在这一百年里，不仅发生了由大清到民国、由民国到共和国的转变，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主义与思想，也诞生了与传统迥然不同的新文学。时间虽然短暂，但由于处于历史的剧烈变动期，却留给了中国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巨大的活动空间。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近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思潮、文学等，也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镇。“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就是我们作为当代学人对这个时代文学思考的成果。

本丛书的作者都是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重点学科、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中青年教师。海南师范大学成立于1949年，迄今已



有六十余年历史。由于历史的原因，它经历了由学院到师专，由师专到师院再到师大的曲折过程。但无论什么时候，海南师范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都是学校的优势学科。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海南师范学院调整为海南师专，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全国学联主席、中国新诗的开拓者、时任华南联合大学文法学院院长的康白情，也被调到海南师专任中文系教授。虽然这是作为学者、诗人的康白情人生中与海南的一次短暂交集，且不乏贬谪的苦涩意味，但他的到来还是为当时海南这所唯一留存下来的高等学校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记。康白情在海南师专工作期间，虽然主讲的是中国古代文学，但他作为五四运动的组织者、新文学的直接参与者，却给当时中文系的师生们以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当师生们得知郭沫若是因为读了康白情的《草儿》等新诗，“委实吃了一惊，也唤起了我的胆量”才开始写作新诗之后，他们对中国新文学的感受更直接了。海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一向有写诗的传统，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一向有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热情，与此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一大批优秀人才怀着创业的激情从内地来到海南，特别是海南建省之时，更出现了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盛况。本学科现在还在工作的几位骨干老师就是那时候从内地高校来到海南的。这些老师的到来不仅强化了当时尚在发展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而且，他们还以辛勤的努力和众多的学术成果，让地处一隅的海南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步入了国内学界的先进行列。20世纪90年代以后，海南师范大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有了更好的发展机遇，不仅被批准为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重点学科，还被国务院学位办列为博士学位授予权建设学科进行立项建设，海南师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从此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就是我们这些年来学科建设成果的集中展示。

本丛书的编写原则，以集中体现个人的研究方向、特色为主，不强求体例上的一致性。总体上看，这套丛书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明确的问题意识，是丛书的第一个特点。丛书的作者虽然都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但普遍有着自己的专长与学术兴趣，有些问题已经研究了多年，有着比较深厚的学术积累，因而使丛书具有较强的理论建设意义。积极的创新意识，是丛书的第二个特点。丛书的作者特别是年轻的作者多是近些年来新毕业的博士，思想束缚少，学术上有冲劲儿，虽然有许多论题并非人所未论，但由于观点新颖，故而研究也不乏新意与创意。当然，我们也知道，由于研究者自身的局限，丛书的一些观点未必完全正确，学术质量也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不管怎样，如果这套丛书能够对读者在学术上有所启迪，我们的目的与愿望则庶几达成矣。同时，借丛书出版的机会，我们更加期望得到学界同行和热心读者的指教。

本丛书既是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省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重点建设项目，也是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博士点建设专项课题的成果，特记。

是为序。

房福贤

2012年5月1日

于海口金花村

序

毕光明教授发来一部书稿，嘱我写几句话，放在书的前面，我乐意为之，就随手记下了一点读后的感想。

从纯文学的视角谈新时期文学，这是我见到的第一部书稿。据作者在本书“后记”中说，他从这个角度研究新时期文学迄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而且此前还出版过三部与这个论题有关的著作（其中两部与姜岚合著），是这项研究辛勤的开拓者和执着的坚守者。单凭这一点，他的这部集前三著精华又融汇新作的书稿，撷英咀华，就值得一读。

我孤陋寡闻，实在不知道纯文学一说源于何处，出自何人之口。就阅读印象而言，似乎与欧美诗人对“纯诗”的提倡和追求有关。关于“纯诗”，往远处说，可以追溯到美国诗人爱伦·坡的诗说，稍后一点，是受坡影响的西方象征主义诗人的理论；往近处说，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受西方象征主义诗人，尤其是后期象征主义诗人影响，同样标榜象征主义，或被别人封为象征主义的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的提倡。这其中还应该与西方非功利的审美观和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关。这些理论和提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希望把诗歌由表达感情的工具，变成表现感觉的手段。因为感情是由外物引起的，外物联系着不纯粹的大千世界，所以诗歌所表



现的感情就不可能是纯粹的。但人的感觉不同，它虽然也接触外物，但却不依赖外物，不是因外物而生，而是人自身的一种特质和功能，是人的生命的一种感性显现。因而说诗歌表现感觉就无异于说诗歌表现生命。因为生命是纯粹的，所以这表现生命的特质及其感性显现的诗，就是纯粹的诗，或曰“纯诗”。这当然是一种简化了的说法，实际上，纯诗的意念自萌生之日起，就不停地有人往里面掺加各种文化元素，对其特点和表现作不同的强调。喜欢直觉的强调其心灵感应，喜欢超验的强调其幻觉梦境，喜欢音乐的强调其音韵和谐，喜欢色彩的强调其视觉冲击，喜欢中和之美的强调其听觉和视觉、语言和意义、感性和理性、本能和规范、直觉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等诸多方面的统一，喜欢神秘主义的强调其玄思冥想、仙灵幻术、魔法符咒、直觉意念、官能感应、心理暗示、象征隐喻等诸多因素的完美融合，走向极致的则希望最终达到一种超越现世、超越人类、超越真理的“至精至美至纯至善”的境界。西方人称这种境界为“与圣灵一体”，中国人则称其为“天人合一”。西方人称其为“纯粹”、“绝对”，中国人则称其为“含蓄”、“蕴藉”，如此等等，总之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也是世界上最难得到的东西，在诗中，则是最难达到的境界。也因为如此，所以提倡“纯诗”最力的瓦雷里才说：“纯诗事实上是从观察推断出来的一种虚构的东西”，“纯诗的概念是一个达不到的类型，是诗人的愿望、努力和力量的一个理想的边界”。

说了这么多“纯诗”，该说受“纯诗”影响的“纯文学”了。我不知道围绕“纯文学”曾经发生过哪些争论，以我浅显的观察看，它既受“纯诗”概念的影响，就必然与“纯诗”有一些相同的追求和旨趣。只不过因为“纯文学”的概念过大，包含了诗和非诗在内的诸多文体，尤其是为“纯诗”所忌讳和排斥的诸多散体的文字，或广义的散文文体（包括

小说),所以就不能像“纯诗”那样单讲一己的感觉,还要容纳纷纭繁复的大千世界,亦即我们常说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也不能像“纯诗”那样,只重声音和色彩的暗示,还要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样的形式,尤其是世俗的日常化的表达形式。凡此种种,虽然其中也可能不乏“纯诗”所追求的感觉和艺术元素,但就感觉的纯粹和形式的玄奥这两个属于“纯诗”的最高品性而言,所谓“纯文学”显然是不能以之为鹄的的。这样一来,“纯诗”影响于“纯文学”的,除了这个概念所标榜的纯粹性的理想之外,就主要是它的“为艺术而艺术”,即坡所说的“为诗而写诗”的基本观念,而不是它对“绝对诗性”的这些独特追求。借助这个基本观念,“纯文学”以追求“文学性”为目标,努力摒弃非文学的政治功利因素,和消解“文学性”的“通俗化”倾向。而将它的“纯”性,定位在表现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尤其是人的精神性存在和人的精神性价值的层面。包括文学作用于人的方式和人对于文学的态度,也以是否能引起精神的愉悦和是否作为审美的对象待之为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毕光明教授对“纯文学”的界定有其合理性,他说:

什么是纯文学?“纯文学”是相对于“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而言,更关心人的精神存在的文学。同主旋律文学着眼于现实社会秩序的维持相比,纯文学从更长远的时间里考虑人的自我实现、全面发展。同通俗文学供人消遣,替人宣泄相比,纯文学促人自省,将人的灵魂提升起来,避免在物的世界里完全沉沦。纯文学的审美性在本质上与宗教的功能相近,反映的是“以审美代宗教”的精神意向。要是从文学总体来看,纯文学是“文学中的文学”,是好的文学,是文学性写作这种精神创造中最精致最美好的产品。都是产品,好的产品价值自然更高,



因为它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证明。无意义的人生因为能够从事高级的精神创造才显得有意义。纯文学使文学同非文学的意识形态品种明显地区别开来。正因为有独特的作用与功能，纯文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纯文学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误解的那样与现实无关，不批判现实。纯文学是拉开距离看现实，规避流行价值的影响，从一定的高度、在历史视野里批判现实，这样的批判才更准确更有力。纯文学不把现实问题仅仅归结为制度安排，而要追索它的文化的和人性的原因，它能够回答为什么有这样的制度安排。这显然是主旋律文学和通俗文学不可企及的。

在这一大段引文中，除了“主旋律文学”和“通俗文学”这两个概念本身的含混，容易让作者的观点发生歧义外，作者有许多说法与“纯诗”理论确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文学中的文学”、“好的文学”、“最精致最美好的产品”，与瓦雷里所说的“绝对的诗”；“纯文学的审美性在本质上与宗教的功能相近”，与梁宗岱所说的“超度我们的灵魂到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界”等。但他的意思又显然不在表明“纯文学”概念所受“纯诗”理论的影响，而在对“纯文学”与“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的性质和功能加以理论的区分。通过这种区分历史地考察“纯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或类型），它的形成和发展，对“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为此，作者依次从“新时期”以来发生的重要文学潮流，及他所选定的一些典型的作品个案中，细心地过滤、爬梳、阐发、剥离各种“纯文学”要素萌芽、生长的迹象，以此展示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告别政治化的历史的同时，又抗拒商品化的现实所走过的曲折历程。虽然这种政治化倾向和商品化倾向不能简单地以“主旋律文学”和“通俗文学”名之，但却包含有作者所说“主

旋律文学”的政治性和“通俗文学”的商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毕光明教授的这部书稿也可以当作一部“纯文学”在新时期承前启后、发生发展的历史来读。

是为序。

於可训

2012年6月3日写于珞珈山两不厌楼

目录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总序	房福贤 / 1
序	於可训 / 1

第一章 八十年代的文学潮流

历史转折与文学复兴	2
人的文学：从“伤痕”到“反思”	41
新诗潮：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	51
文化对逆中的现代派文学潮流	71
精神的八十年代	98

第二章 从废墟上崛起的新诗

朦胧诗的美学原则	104
北岛：艺术对现实的超越	117
顾城：一种唯灵的浪漫主义	130
舒婷的情感世界	143
谢冕北岛会谈记	152

第三章 归来作家的创伤记忆

作为人格精神的“归来”的作家群	166
-----------------------	-----



人生实现与文学实现:王蒙审美意识的张力场	179
《活动变人形》的结构艺术	194
张贤亮小说的创作模式	206
“七月派”三位落难诗人的悲怆写作	219

第四章 寻根作家的创作意识

文化,与生存同义	230
“最后一个”:南方文化的钩沉	237
“异乡异闻”:生命本质的思考	243
《马桥词典》的语言哲学	249
《红高粱》的历史哲学	253

第五章 新世纪的纯文学写作

文学面对现实的两种姿态:以“底层叙事”为例	260
《生死疲劳》:对历史的深度把握	271
《人面桃花》:关于时间的小说	282
《拾婴记》:人世温度的一次测试	286
拥抱美好的生命:格致散文启示录	290

第六章 小说经典的文本分析(一)

文明落差间的心灵风景:铁凝的《哦,香雪》	302
弱者复仇的白日梦:莫言的《月光斩》	312

传统乡村文化孤魂的祭奠与礼赞: 韩少功的《怒目金刚》	315
被掌控的现代人: 范小青的《我们都在服务区》	319
难以告别的革命: 蒋韵的《红色娘子军》	324
权力欲与大学病: 汤吉夫的《大学纪事》	329

第七章 小说经典的文本分析(二)

无药可治的生命之疼: 陈希我的《我疼》	334
欲望时代的爱情病理分析报告: 盛可以的《手术》	338
爱情里的人生哲学: 方格子的《像鞋一样的爱情》	342
触摸最柔软的部位: 王手的《软肋》	346
天寒地冻有温情: 杜光辉的《洗车场》	350
乡村女性的情欲戏剧: 晓苏的《花被窝》	354

第八章 纯文学立场的可能性

理解纯文学: 兼与李陀先生商榷	362
纯文学及其研究的价值: 对一种文学歧视的歧见	366
多元批评格局中的纯文学批评	371
文学批评: 第三种标准	377
为了生命的重量: 《老屋的歌: 史铁生创作论》	381

后 记	387
-----------	-----

参考书目	395
------------	-----

第一章

八十年代的文学潮流



历史转折与文学复兴

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的文学，在当代中国被严重地政治意识形态化，一种源于20世纪20年代，进入新中国以后愈演愈烈的激进主义社会思潮，胁迫、驱使也抬举着文学充当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主义社会实践的宣言书和辩护词。文学乃成为一种先验的镜像，给了乌托邦政治以虚幻的信心，鼓舞着后者高蹈在反现实的革命高调中。文学被一向重视舆论作用的革命主体高度重视，其宣传功能被大力强调，最大限度地实现了集体神话对公众思想的占有权力，它的另一面就是审美本性的不断丧失，终至沦为革命功利主义文学的仆役。这种革命功利主义文学，在“文革”中达到了巅峰，也走入了绝境。

1976年，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动终结了一个务虚时代，文学也适时地起死回生。1978年底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新文学的全面复兴提供了契机，在久未有过的相对宽松的政治气候下，文学平行于政治生活实现了拨乱反正，通过对激进主义文艺思潮的清算，由恢复真实性到追求审美创造，完成了向本体的回归。作为一场文学复兴运动，“新时期文学”以不作宣告的文学革命否弃了当代政治主体营建的文学规律及表现形式，而与“五四”文学时代遥相呼应，承接起新文学运动前期确立的现实批判精神、生发于个体体验的浪漫主义想象力以及人生关怀和心灵自由的艺术品格。

这是一个十分注重价值创造的文学时代。它不盲目否定本民族历史悠

久的文学传统，但又对域外文学特别是现代西方文学表现出高度热忱，加以全方位的艺术借鉴。理论上的探讨和重建，批评的推波助澜，创作的竞争与角逐，形成此起彼伏的文学浪潮，现实环境所提供的机遇使纯文学得以复兴。仅仅着眼于诗歌、小说，便足以论断这十年创造了新文学史上不朽的文学时代和非凡业绩。尽管它或许只是一个更从容不迫因而也更有实绩、更伟大的文学时代的序曲，但这一先声夺人的序曲，既萦绕着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的尾音，又喧闹起新时代主旋律的多个声部的复杂性，值得一再回味。

一 谬误尽头的变迁

1976年9月，毛泽东辞世。同年10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倒台。中国当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动，中国历史结束了一个梦魇的时代。

以“十年浩劫”作为惨重代价的时代转折导致的绝不只是某种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修正，而是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变革、反省与重建。

（一）十年一觉“文革”梦

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全国性动乱及其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创伤，一个明显的教训是，在一个封建意识没有根除，宗法制的人身依附关系还变相存在，个人的存在价值还得不到法律保障的社会里，越是革命，越是以“人民”的名义出现的口号，越能剥夺大多数人的思想和生存的权利，越能掩盖少数人借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行愚民政策，任意奴役和驱使缺乏科学和民主意识的普通民众，以满足他们的权力欲和政治野心的真实目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登峰



造极，整个民族陷入一种疯狂状态。人们戴着红袖章，擎着“红宝书”，向领袖高呼万岁。到处都是红旗、红标语、红色组织、红色政权，全国城乡一片红海洋。“三忠于”、“四无限”的宗教献词遍布墙头，触目皆是，连出工种地、吃饭睡觉都要举行效忠仪式。参加了“革命”的人们都感到身价百倍，而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参加者早已沦为文化专制的工具 and 对象。

1. 红卫兵：悲剧角色

在这场席卷一切的运动中，思想单纯、生命冲动勃郁、在一面之词的教育制度下长大、对“革命”壮举和建功立业充满神往和激情的青年学生最先被利用，充当了不分青红皂白地扫荡一切人类文化和打乱现行社会秩序的先锋力量。这些青年人在一场声势壮阔、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中演出了可歌可泣的悲剧。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被蒙蔽或自我欺骗，被利用或自我扩张，因而极其虔诚、极其坚贞也极其狂热地投入了保卫革命导师、完成世界革命的红色浪潮，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厄运，就像郑义的小说《枫》里写到的那样：一位美丽单纯，学习成绩优异，对人生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少女——高中生卢丹枫，在“文革”斗争中，不幸与同她彼此萌发了初恋之情的男同学李黔刚站到了观点对立的组织里。在中央首长“文攻武卫”口号的鼓动下，对立的两派终于兵刃相见。卢丹枫和李黔刚都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当中。一方面，他们不能忘记更不愿中断青春的生命交给他们的恋情，而与此同时，他们对各自认定的红色组织和革命观点都坚信不疑，都决心在“文化大革命”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爱情与革命、生命与信仰之间，他们面临着冲突与选择，而结果，他们选择的是后者。在一次攻守战斗中，卢丹枫从枪口下放过了他的情人，最后他们坚守的教学楼被李黔刚（此时已改名为李红钢）带领的红